

徐渭與心學

第一册



張鑒著

徐渭與心學

第一冊

綫裝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徐渭與心學 / 張鑒著. —北京：綫裝書局，2006.1

ISBN 7-80106-578-6

I. 徐... II. 張... III. 徐渭 (1521 ~ 1593) - 人物研究
IV. K825.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6) 第000098號

徐渭與心學
(一函三冊)

著者
責任編輯
出版發行

張鑒
任夢強 孫嘉鎮

綫裝書局

北京西城區鼓樓西大街四一號

郵編 100009

電話 64045283

北京梅之韵制作公司

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06-57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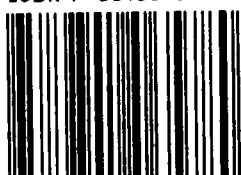
定印書版印制

價數號次刷版

三六〇圓

一一一〇八〇套

ISBN 7-80106-578-6



9 787801 065780 >

序一

日前，張生持書稿來訪，曰：「先生關心之徐渭研究，書稿已成，友人擬爲刊行，敬煩著序。」彼張生者，即青州之張鑒也，昔年即酷愛書畫，每請海內名家至桑梓揮毫，藉便觀其運筆落墨，由之參悟繪事，得寫生入手蹊徑，時邀友人徜徉山林，手携紙筆，即興圖寫。不數年，所畫山水日進。余之識張鑒也，即在青州，亦其山水進境時也，見其謙謙好學，殊覺可喜。更後，忽相逢於美院，蓋已入高研班，改攻花鳥，師從郭怡棕先生。又後，則考取花鳥博士班，繼續從郭師研習。余奉命忝列該班理論導師，得以披閱論文習作，觀其討論寫意花鳥，辨析源流，衡評得

失，好學深思，似非一日之功，益覺孺子可教，乃列名指導，樂觀其成。及至選題青藤，方知胸有成竹，蓋苦心孤詣，搜集資料，鑽研舊學，已沉浸多年也。余之重視青藤，始於齊白石之稱揚，繼之先後讀李松、徐倫、梁一成與李德仁之撰著，殊覺諸家研究已頗全面，欲再突破，非專題深入莫屬，所深入之專題，對博士生而言，倘着眼文化思想似可有得，此亦近年國際治學之趨勢焉。迨相與討論，張生亦謂擬從徐氏學術思想及社會文化入手，以「所至之由」究「成功之美」，余大為驚異，竊思彼於治學已窺門徑矣。茲後雖有所點撥，更勉其奮力創作，以證知易未必行難。今見書稿，條分縷析，考證詳明，論述得法，遵守規範，所揭青藤與王學諸子淵源，確有發前人所未發者。

乃悟造就學者型畫家，雖非易事，亦不必視為畏途。又思此書之刊佈，于鼓勵畫家而攻博向學者，豈非有力鞭策乎？乃欣然命筆著序，並告張生曰：「古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汝雖有創獲，幸勿滿足，宜再接再厲，進而破解學術思想與藝術風格關聯之謎，斯可臻於博士論文之詣也。汝年尚輕，一書一畫之成易，一生一世爲人治學難，倘有恒心，有成可望，慎之勉之，勿忘余拭老眼以待也。」

癸酉深秋方壺樓主薛永年

在藝術史中，對一位藝術家的研究必須盡可能深入到他經歷、思想、作品的所有細節，並由此引申出新的認識。其中與思想有關的研究，難處在於兩點：藝術家的思想與思想史的關係，以及他的思想與創作的關係。人們往往根據一兩處文字記載，直接推導出其思想的「淵源」，至於思想與作品的複雜聯繫，更是被簡單地處置。但祇要稍為推究，便不難發現其疏漏之處。

一般說來，藝術家即使留下一些文字，也大都不是思想性著作，其中與思想的關聯，一是稀少，二是隱約，要根據這些文字把作者的思想還原到當時的景況中去，祇有依據

文獻中一切可能利用的細節，動用全部智慧，竭盡全力去加以解讀。張鑾在他的徐渭研究中，正是這樣去做的。他修正、補充了人們對徐渭思想的認識，如詳細考察了徐渭的交游，從中發現不少新的線索，對徐渭與王畿、季本、唐順之等人思想上的聯繫進行了細致的考辨。雖然所獲得的結論祇是徐渭思想研究中的若乾點，但這卻是一些重要的點，它們可以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更為準確的藝術家的精神肖像。張鑾之所以能做到這些，是因為他大量的閱讀、勤於思考，並善於發現問題。

當代藝術史研究已經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如史料的發掘（重視過去被認為不重要的材料）、問題指向的改變（從藝術現象出發而提出關於文化史以及哲學、語言學等學科的

問題），這是一些重要的轉變，它大大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和對藝術與其他領域相關性的認識，但是傳統的方法、思路仍然有其重要意義：由基本文獻出發，通過細讀發現問題，修正已有的結論。特別是當我們在清理對藝術史已有的認識，發現對基本文獻的利用還很不充分，甚至結論還多有不當時。我們不能不在採用新的方法與思路的同時，清理我們已有的基盤。這樣，從兩端同時進行的工作，成爲一種將我們對藝術史的認識不斷推向深處的動力。

張鑾在這裏所使用的是傳統的方法，但獲得了一些重要的結論。隨着對傳統思想和現代思想的深入，他對藝術史的研究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中央美術學院培養藝術實踐方向博士生，是一種探索

和嘗試。一位以創作爲畢生志向的藝術家除了在藝術創作上必須達到一定水準外，能不能在學術研究中取得成績，是所有導師和同學都十分關心的問題。張鑾《徐渭與心學》的出版，不僅是他個人的成績，也給了我們一種信心。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邱振中

明代畫家徐渭，是中國大寫意花鳥畫派的開創者。他在文學、詩歌、戲曲、書法等方面成就亦非常突出。由於他的貢獻和影響，曾被列為「中國十大畫家」之一。因而近世對徐渭之研究已漸次形成專門之學問，姑稱之為「徐渭學」。

壬午秋冬，我應邀為中央美院博士研究生班講授《中國哲學與中國畫》，時張鑒博士生警敏卓識，予我 很深印象。他當時已決定研究徐渭，因我十年前曾出版《徐渭》一書，故之多次交換意見，發現他研究方法非常縝密，收集文獻極為廣博，並於中國哲學深有所悟，遂信他於徐渭研究必

有收獲，盼其著作早成，先睹為快。近日張鑾君《徐渭與心學》脫稿，並擬出版，托我寫序。亟讀之餘，喜不自勝。書中成果創見頗多，發前人所未發，已把徐渭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書中四大章，分論徐渭生平、學術師承與交游、王陽明心學派對徐渭的影響、徐渭書畫淵源與表現因素等。各章俱皆中綮，而以第二、三章創見成果最為突出。第二章通過對王畿、季本二師為代表的學術群體與徐渭過從關係的細致疏理，詳盡提示了徐渭與陽明學派諸傳人的密切關係。第三章則從哲學的層面，探索徐渭學術思想與王陽明心學流派的淵源關係，對於徐渭藝術思想上的「本色」追求、「狂者」氣象、「三教」皆重，以及「不學而天

成」的「本自然」觀、「憤懣相生」的「狂掃」表現觀等，皆找到了師承與學術根源，同時對徐渭與師承有所不同的個人創見，亦有所指明。第三章後附的《徐渭與王門學派及相關重要人物譜系圖》，實是一、三兩章的總括，把徐渭與陽明學派傳人二十餘家的多重複雜關係，以圖表形式表示，最為簡明。這些多是前人所未曾做過的，亦正是本書主要價值所在。至于第一、四章及附錄中亦有不少精要，讀者寓目自可領會。

藝術是文化之載體，藝術的發展創新，實則是社會之文化發展創新體現於藝術的結果。中國畫發展到明代出現了徐渭為代表的花卉大寫意派，正是中國文化發展到明代中期以後出現了盛極一時的儒學新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

「心學」，在藝術中體現的結果。王守仁祖籍浙江余姚，自父輩即移居紹興，所以他自幼生活在紹興，中年以後講學於紹興會稽山陽明洞，所以稱「陽明先生」，稱其心學爲「陽明學」。受學和傳播者亦大都是紹興人，因此紹興是陽明心學的中心，陽明心學亦可稱之爲「紹興學派」。徐渭生長於紹興，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爲陽明心學二代傳人中之佼佼者，後半生主事藝術創作，故學術體現爲藝術是當然之事。雖然徐渭學綜三教，而心學之影響是最重要。因此要揭示徐渭藝術的內在文化本質，自然必須梳理其藝術與心學的淵源關係。十餘年前我在《徐渭》書中曾對此開始進行探討，限篇幅，尚感疏略，後因繁忙，未成續作。今見張鑾君大著竟已對徐渭與陽明學派之關係源流梳

理如此嚴密翔實，切鑿有據，相信關注徐渭藝術者讀到此

書，自必獲益匪淺。

心學者何？心靈之學、聰明之學、智慧之學也。其源可上溯於《孟子》「盡心」論。我嘗考古文獻，「心」之在人有四涵義：一、思維認識器官；二、思維認識活動；三、思維認識能力（包括方法）；四、思維認識成果。孟子之「心」主要包括後三種涵義。「盡心」論即是說：人能盡其思維認識之能力範圍，即可了解掌握天地萬物本性。南宋陸九淵、明代王守仁心學，發揚孟子等觀點，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是謂一切物和理皆在人的思維認識活動能力範圍之內。又說「心即理」，是謂人們思維認識活動與能力之結果即是理。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在「理」和「知」

問題上存在分歧。朱熹認為在事物中本來地存在「理」，亦即「天理」，聖人對社會事物的論說都是「理」。心學則認為沒有人的「心」（思維認識活動和能力）就不可能總結出「理」，聖人講的「理」都是「行」（實踐）、過程中「心」的作用的結果。聖人講的理並不是「至善」（最高完善）的，至善祇能在「行」之人的「心」中求得。所以心學否定了聖人之「理」的絕對正確性，強調正確的認識必須是在人們自己的「心」（思維認識）中獲得，故心學稱「至善祇在心中」。因而心學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在「知」的問題上，朱熹認為《大學》八條目中「致知」的「知」，是認識事物的結果，即知識，「致知」是最高的知識。心學認為「致知」的「知」即是「良知」的「知」，即思維認識活

動和能力。「良知」就是最優良的思維認識活動和方法能力。「致知」就是要「致良知」，即開發和做到思維認識活動和方法能力的最優程度。知能若低劣，便不會正確格物獲得至善之理；祇有優良的知能才會正確格物達於至善。心學在強調「致良知」的同時特別重視良知與「行」（實踐）的統一，王守仁稱之爲「知行合一」。心學中蘊含着大量智慧內涵，體現着三教文化的高度概括總結。

心學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最先進的學派，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學派之一。對中國十五世紀以後的社會和思想文化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後來被清代康熙以來的黑暗政治統治撲滅了。中國社會從此進入思想史上長達二百餘年的黑暗期。思想的黑暗導致了國家急速落後。以